

资政类纂

資政類纂

京新登字209

资 政 类 纂

张长法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许昌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开 45.75印张

199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46-X/K·0157

印数10,000册 定价35.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吸收了历代典籍中有关领导科学方面的精华，经过认真整理后，根据内容的性质分为十二卷。即《品德类》、《才学类》、《经世类》、《爱民类》、《用人类》、《重教类》、《理财类》、《武备类》、《法制类》、《纳言类》、《应变类》、《廉政类》。每卷所选材料，大体上按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每则正文的后面都附有注释、大意、说明各项，分别对正文中的难词、难句以及它的主旨、背景加以疏解、翻译和阐述。阅读时，开卷了然，省时省力。

前 言

我们阅读了《五经》、《诸子》、《二十五史》以及历代名人存留下来的文集之后，发现了许多对于我们仍然有用的东西。古人在很多问题上所讲的道理是深刻的、正确的。他们对于如何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如何保持个人的美好情操，如何提高民族的素质，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的民本主义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用人路线；“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欲无寒而去衣”的依法治国的方针；“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不善者，吾则改之”的勇于纠正过失的勇气；“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军事学说等，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反而应当倍加珍视。

我们把所得到的资料经过仔细甄别、梳理之后，根据内容的性质分为十二类。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首先应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晋书·袁宏传》说：“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全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这

段话告诉我们：身居高位的人如果不能用大公无私的态度去处理事物，那么他们的下属就必然以权谋私。因此，傅玄在《傅子·正心篇》中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李世民在《帝范·务农篇》中也深有体会地说：“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止其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澄其流”。

一个当权者的品德是否高尚，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做到大公无私。明代吕坤《呻吟语·卷上》说：“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所以傅玄在《傅子·问政篇》中，才反复告诫人们“政在去私，私不能去，则公道亡”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把“仁”当成自己的心，把“义”当成自己的路，做到廉洁恭俭，艰苦朴素。象《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那样，“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不贪女色，不贪游乐，不嗜美酒，不贪财贿，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百姓公仆。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应该有丰富的才学。即通晓有关改造自然、治理人类社会的广博知识。李世民在《帝范·崇文篇》中说：“引导风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吴兢《贞观政要》说：“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这段话说明，没有一定的学问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如果决策时背离了客观规律，那么愈是努力，离成功就会愈远。甚至，会把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唐代贞观二年，李世民同房玄龄讨论学习问题时，曾结合他当皇帝的亲身体会说出了“为人大须学问”这句话。《颜元集·习斋记余·卷一》有几句说得也很深刻。“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

至于求得学问的途径，除了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以外，虚心向懂得的人请教、询问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魏源在

《默觚下·治篇二》中说：“人有恒言曰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孔子说的“三人行则必有吾师”确实很有见地。清代刘开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在《问说》中说：“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这些话可以永远当作我们的座右铭。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不仅具备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才学，而且要求他们把这些东西落实到治国的实际中去，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地区治理好。这才是修养品德，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古人所说的“经世”，实际上就是这种意思。《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说的就是解决百姓的吃、穿、住、用的问题。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实质上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治理国家的大业千头万绪，然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治理好官吏。《周礼·卷二》很早就提出“以六典治国家，以八法治官府”的论断。历史证明：对各级官吏没有严格的监督是不行的。这种思想到了韩非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韩非子·外储说》中说：“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吏者，民之本纲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把“爱民”当成经世治国的唯一宗旨。贾谊《大政上》说：“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唐甄《为政》中也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为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利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受殃民之诛也，安得受赏哉！”这段话的意

思是说：对官吏的要求，主要不是看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怎么样，而是看他们的政绩是否突出，是否给百姓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因此，爱民的标准不是抽象的，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就是王符《潜夫论》中所说的“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只有这样做，最终才能避免覆舟之患。

使民富裕的办法，首先是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就得解决土地问题。宋代李觏在《平土书序》中说：“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也。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李觏这种主张，可谓抓住了“富民”、“裕民”的根本。只有这样，粮食才能有三至九年的储备，避免“不足”、“懈怠”、“穷乏”等现象的发生，从而使百姓摆脱饥寒的威胁。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德、才兼备，把爱民当成终生为之奋斗的归宿的当权者要解决好用人问题。因为，能不能正确用人，即能不能做到任人唯贤，关系到治国大业的成败。《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王符《潜夫论·思贤》中说：“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治；国之乱，待贤而治。”

如何识别人才？《周书·苏绰传》提出了一种经过实践考查其优劣的方法。他说：“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淮南子·汜论训》也提出了一种观察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从而加以识别的方法。即“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

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意思是说，人的感情与思想的美与丑善与恶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具体的言行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品德与出众的才华，在各种不同处境的人的身上同样都会闪耀光辉。

对待人才的态度应该是尊重、信任、使用，不要求全责备。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的“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李世民《金镜》中说的“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讲的全是这种事情。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在任人唯贤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象人身上流动的血液，须臾不可短缺。它既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必由之路，也是“化民易俗”的重要手段。它对于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董仲舒《春秋繁露》说：“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可见，教育在一个国家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忽视教育是极大的错误。

学校是教化的本原，是培养人才的基地。《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从此可以看出，古代非常重视学校的布局。这是教化的大堤，它可以防止错误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泛滥，防止犯罪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

为了使能够主动学习，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古人很早就提出了开发学生智力，运用启发式进行教学的问题。《论语·述而》说：“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懂得，在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内因的

作用是决定性的。只有外因而没有内因，事情就不会发生转化。所以，他主张当学生不愿意学习，不主动动脑思考的时候，就不要再教他们知识。《礼记·学记》中还说：“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与思，可谓善喻矣。”

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荀子·礼论》说天地是生物的根本，先祖是人类的根本，君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他劝诫人们应该“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搞好经济，注意财政收入的不增长，因为一个国家、一种政权，如果没有一定的财力，不仅办不成什么事情，恐怕连自身的存在也难以维持。苏辙《上皇帝书》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有之。”徐鹿卿在《奏已见札子》中说“国之有财用，犹人之有血气。气血耗竭，何以强身？财用空匮，何以立国？”管子则把搞好经济放在治国的首位。经济问题解决了，生产搞上去了，其它问题，如教育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军事建设问题等则会迎刃而解。《管子·牧民第一》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几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财政经济是立国的基础。

怎样才能搞好财政呢？《淮南子·主术训》说：“故有人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罹饥寒之患。”《三国志·魏志》也说：“圣王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俭用则财蓄。”意思是：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没有不把扩大农田面积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的，没有不把节约费用当作供给的原则的。扩大农田耕种面积，粮食就会多积蓄，节约开支，财物就会有剩余。司马光在《论财利疏》

中说：“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不仅要搞好经济，而且要搞好武备，使国防力量不断增强。《孙子·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军队不仅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也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叛乱以及遏制盗寇的扰害。所以荀悦说：“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

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很注意战争的性质。为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而战就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必胜。《淮南子·兵略训》说：“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因此，“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反之，违反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军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外表上不管多么强大，实际上也是一触即溃。殷纣王的军队在牧野之战中土崩瓦解就是一例。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很注意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如何对战争的全局进行筹划和指导，如何依据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照顾战争全局的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何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孙子·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又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用兵作战的最高境界。

除战略外，对战术问题，即战役战斗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得也很详备。如何根据敌对双方的具体情况以及地形和天候的条件去战胜敌人论述得非常精彩。《孙子·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乱

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军争篇》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堕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毛泽东同志对这些论点曾经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并且已经引起世界的普遍重视。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一定要健全自己国家的法制，努力做到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没有一系列的调整彼此关系的行为规范，或有一定的规范而不能遵守，做了坏事受不到惩罚，做了好事得不到鼓励，那就无法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晋代傅玄《傅子·治体篇》说：“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南齐书·崔祖思传》中说：“天下治者，赏、罚而已矣。”王安石在《周公》一文中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既要实行法治，就要做到“明法”、“壹刑”。法律面前没有特权，无论对谁都是一个标准。该赏就赏，该罚就罚，公正无私。《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反之，如果“一事殊法”、“同众异论”、“刑开二门，”这将会使法律失去约束、规范人们行动的意义。这样，大臣就会争于私而不顾其民，握有权力的人肆无忌惮，无限度地放纵自己，长此以往，国家势必受到危害。

在法律的宽、严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主张对上严，对下宽。即对当权者要严，对没有权力的百姓要宽。关于赏、罚的关系，在赏的问题上从宽，在罚的问题上从严。《尚书·大禹谟》说的“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正好

体现了这种思想。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不仅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还要求他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个区分明君和昏君，忠臣与奸臣的一个重要标准。王符《潜夫论》说：“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故人君通，必兼听。”王符的意思是：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能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解决“纳言”、“兼听”问题，也是重要的关键之一。秦二世偏听偏信，国灭身死；尧、舜兼听，天下大治。所以《三国志·吴志》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

国君要敢于让大臣说话，甚至说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想法。这样，国君才能了解天下的真实情况以及他们的好的建议。否则，国君就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因而，也就无法正确解决问题。诸葛亮在《便民十六策·视听》中说：“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正因为这样，历代的明君、贤相对“纳言”、“兼听”

“受谏”都非常重视。李世民把谏言比做“医病之良药”，“苦喉之药石。”把讨好奉承的话比做“甘口之鸩毒”，并且在《帝范·去谗篇》中告诫人们说：“故明主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之从谀，命因甘而致损。”

要解决纳谏问题，就要做到“不以人废言。”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说得对，当权者都应认真采纳。《淮南子·主术训》说：“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豢，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这段话确实算得上至理名言。只有认真实践这段话，才能真正做到“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否则，只能是挂在嘴上，摆摆样子而已。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还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通晓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制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机动灵活，审时度势。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以，一切政策法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商君书·更法第一》说：“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子·南面第十八》说：“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这些话说明：治理国家要不断地实行改革，适时地废除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法令、制度，习俗礼仪。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当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教条主义者。

客观事物有不断变化的一面，而且这是绝对的，但是它也有相对静止的一面。所以，国家的政策和策略也要求相对的稳定。因为它本身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李世民的话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又说：“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这些话说明法令制度、政策一旦确定之后，就要认真贯彻执行，不能随意变动。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做一个“朝令夕改”式的机会主义者。

政策法规的改革，同穿衣、吃药一样，一定要符合实际。《新语·术事》说：“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淮南子·汜论训》又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总之，改革应变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以利民为本”。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仁人志士要求一个好的当权者不仅能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要实行廉明的政治。这种廉明的政治亦称廉政。它要求执行政策的人，即从国君到各级官吏都

能做到清正廉洁、奉公守法、自尊自律。

治理一个国家，能不能做到政治廉明，关系到这个国家事业的成败和当权阶层的存亡。因此，历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对这个问题都很关心。《周礼·卷二》说：“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这说明，国家每年年终都要对自己的官吏进行考核，每隔三年，则进行大规模地全面审查。根据他们的政绩和表现分别进行奖励或惩罚，提拔或罢黜。

权力和地位是奇特的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可以出现不同的结果。它可以是保卫人民、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利益的巨大力量，也可以是祸乱国家，糟蹋百姓，以权谋私，从而产生腐败的温床。因此，历史上有不少的当权者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金钱和财物的诱惑面前不动心，不贪污，不受贿，成为遵纪守法，光明磊落的楷模。《左传·襄公十有五年》记载的子罕以不贪为宝的故事，《晏子春秋》记载的晏子拒受黄金，拒娶美女，拒乘豪华大车的故事，至今传颂不已。陆贾《新语·怀虑》中说：“据土子民，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这几句话，可谓道出了必须实行廉政的实质。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其文化之灿烂，如日如月，其著述之丰富，如烟如海。都计文集，当不下千余万卷。以上所选，不过是沧海一粟。只要我们不搞庸俗社会学，不硬给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那么就会懂得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贵。我们应当承继这一份遗产，并使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各人的专长和爱好，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分为四个小组。先秦两汉部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张长法、许树隶（重教类全部）、王中友、河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李喜荣、河南省广播电视厅王梅英、许昌市委党校刘玉娥同志执笔，魏晋南北朝、两宋部

分由郑州大学朱海风、胡广坤、李邦儒、淮建利同志执笔；隋、唐五代部分由河南省委组织部薛宝兴、河南省纪检委钱良举同志执笔；辽、金、元、明、清部分由郑州大学吕鸿儒、石治安、王振国、梁凤荣、吕锡鑫、陈水明、杨小明、赵秀亭，河南省委宣传部任子厚，《妇女生活》杂志编辑部杜建琦，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陈秀梅、吕俊祯同志执笔。最后由我统读全稿，在做了些必要的修改校订之后，分类编纂，并且写了各卷提示以及前言、编例。

在浩瀚的典籍中选择有用的东西，确如淘金沙江，采珠丽水，错误和疏陋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张长法

1991.4.9

于郑州农业路73号

编 例

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对社会、对国家的治理决不是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才开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早就有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现在它们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是可以接受、利用和借鉴的。这就是我们对古代文献中有关治国方面的言论、故事进行选编整理,辑录成书的唯一宗旨。

二、在如何对国家进行治理这个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流派众多。我们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流传,而且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因为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治理国家的某种规律、某种正确的理论、策略和方法,或是其中的某个正确的侧面。因此,我们在使用诸家的资料时,一视同仁,决不凭个人的好恶,主观臆断,褒此贬彼。

三、根据问题的性质,我们把它们厘分为十二卷。第一卷品德类,第二卷才学类,第三卷经世类,第四卷爱民类,第五卷用人类,第六卷重教类,第七卷理财类,第八卷武备类,第九卷法制类,第十卷纳言类,第十一卷应变类,第十二卷廉政类。每卷前面都附有简短的《卷首语》,对该卷的内容作画龙点睛式的提示。每卷所选材料的主题基本相同,然后按朝代的先后依次排列。上起周、秦,下至明、清,条理清晰,开卷了然。